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西方社会

德国如何在大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

□裘元伦

在世界大变革当中，各国除了一系列正面应对之外，还有永无休止的矛盾与斗争，危机、革命与战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社会发展与稳定，各国各有应对之道。德国在过去将近 70 年间，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主要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作出努力。

政治领域的“定海神针”

二战后的德国政治改革，其程度之深，力度之大，史无前例。1848 年法兰克福议会“运动”、1918 年柏林革命起义、20 世纪 20 年代魏玛共和国（有人称之为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国），都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次政治改革，把德国从一个历史上的封建军事专制国家和刚刚完结的希特勒纳粹独裁国家，改造成为一个基础坚实牢固的民主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人称之为德意志第二民主共和国），而且没有引起多少社会波动。这里的主要“定海神针”是德国人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具体说来，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新的立国原则清晰、坚定。1949 年 5 月通过的德国《基本法》即德国宪法，虽则没有明文规定国家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明文规定国家是选择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道路还是欧洲大陆道路，更没有明文规定国家必须遵循哪种主义，但德国宪法十分明晰且坚定地明文规定了立国的四大原则。基本法第 1 条，要求将尊重人的尊严作为宪法体制的最高准则，另外三个原则是民主法治，联邦制，社会福利国家。

对上述立国原则，全国绝大多数公民及其各主流政党一直保持一致共识。尽管在战后初期（1945—1957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抱某些歧见，但自其 1957 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公布之后，该党也完全认同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艾哈德等人提出并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没有“政治运动”，没有“大翻个，底朝天”。不论哪个政党或执政联盟上台执政，德国一直坚定遵循上述立国原则和全国共识，近 70 年来德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改朝换代”式的国家领导人更替，只是不断适时地调整某些政策主张并付诸实施。

经济领域的坚持与稳定

二战后的德国经济可谓变革连连，主要有四项，其中最为重大的当数把第三帝国的“统制经济”改造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统制经济”的意思似乎不必赘言。至于“社会市场经济”，即使在德国，至今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精确的表述。笔者以为其要点有三：一是基于私有制和竞争，但私有财产不得用于损害社会，竞争必须是有序的；二是实行（广义的）市场自由（创业自由、营业自由、价格自由……），但不放任自流，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人为的”竞争秩序，而不听任“自然的”竞争秩序；三是首先强调经济效率，同时又十分重视社会公平公正。

当今欧洲存在一大堆严重问题，但并不能认定旧大陆必死无疑。只要认真致力于进一步联合和改革，欧洲依然有希望，甚至可能重新辉煌。德国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面临上述重重困难，德国社会始终保持相当稳定，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方面。

德国经济增长一直由一种特殊的“稳定文化”指引着。德国人对经济“稳定增长”有特殊的感受和理解。这些感受主要来自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所经历的痛苦遭遇。一战后，1923 年发生的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让德国人从此染上了几乎是永久性的恐惧症；二战后 1948 年货币改革所引起的价格大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态。德国的这种“稳定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致力财政平衡，偏向货币“从紧”，环境保护领先，技术安全第一，等等。这些都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德国在欧债危机中坚持要求重债国必须整顿财政，减少债务，缩小赤字；为什么德国在 1999 年欧元问世前其货币德国马克国内币值长期稳定，钱真值钱；为什么德国在环保事业与产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德国早在 40 多年前就拥有磁悬浮铁路技术并在汉堡成功投入试运营而后来不在其国内推广，以及德国 2011 年宣布在今后 10 年内关掉本国所有核电站……

德国经济增长始终由一个先进的工业制造业部门支撑着。德国目前加工制造业约占 GDP 的 21%，但如果加上连带的服务、贸易、金融等部门效应，它们保证着全国劳动力就业的 30%~40%。德国加工制造业四大支柱产业——汽车、机械、电器、化学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与适应力，它们的产品 70%~80%用于出口。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德国占世界出口比重一直在 10%上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德国马克对外币值大幅上升年代，“德国货”照常畅销不误，这是它们国际竞争力强大的反映。经济产业强大，有助于国家发达和社会稳定。

德国是一个自愿有纪律、有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盘散沙，凡事杂乱。这突出表现在雇员—雇主关系上。有组织的工会对有组织的雇主联合会，在自主谈判的基础上，以“社会伙伴”的心态和方式解决劳资矛盾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代表雇员的最大工会是德国工会联合会，成员 630 万人；代表雇主利益的则是雇主协会，有 200 万家企业参加，还有工商大会、德国工业联合会等。

德国有些政治家有令人钦佩的政治勇气，敢于推行不受人欢迎的大变革。时任联邦总理施罗德 2003 年提出并实行的《2010 议程》就是一个代表作。尽管结果是社民党下台，党员流失 1/6，但反对党继任者默克尔继续推行这套改革，改革劳动市场，收紧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企业的某些限制，帮助德国成为欧债危机中的“佼佼者”，且继续保持社会稳定。但这次改革的力度其实并不算大，而且德国许多政治家至今依然回避或者说不敢实行必要的重大改革。

社会领域的平衡发展

二战后在德国的社会领域里也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变革。这里简要地来讨论其中的四项，即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两德统一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地区间平衡发展问题。

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西方东方，出于政治考虑与技术原因，都不可能发表有关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真实统计，德国也不会例外。德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往往会缩小贫富差距的真实程度，而那里的左派人士总是会蓄意夸大这条鸿沟；至于代表雇主利益的组织机构和代表雇员诉求的工会，它们各自公布的信息资料自然也会相去甚远。因此，笔者只能参考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加上或减去笔者以为必须“加工”的项目，得出自己的计算结果。如果仅以雇员实际拿到的净工薪来与雇主的收入相比，它们的比例大约为 1:7；通过二次收入分配即再分配，德国“上端”的 20%家庭与“下端”的 20%家庭收入差距大约在 4~5 倍之间。二次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国家财政机构向就业者征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通过社会保险系统向就业者收费（首先是养老保险费），其所得款项，通过许多项目（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病假工资、劳动促进、公务员退休金、有子女家庭补贴、社会救济、住房补贴，等等），由国家转移支付给各个社群，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

社会福利。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举世闻名的。目前，每年大约有 GDP 的 27%左右用于公共福利支出（比较：美国 16%，OECD 国家平均 21%），主要用于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和护理老人。90%的人口从中受惠，但为支撑这一全民福利体系的资金问题已日益难以为继，因此屡遭诟病。

帮助东部地区重建。1990 年两德统一，这给德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至今，20 多年过去了，德国基本上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挑战，把整个东德社会融入了西德。当年曾有人说，实现两德“政治统一”，一天即可完成，只要西部派员去东部接管就是了；“经济统一”需要 10 年，因为要完成东德数千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幅提升其内外竞争力以及重建东部基础设施并非易事；“社会统一”需要 20 年，其主要目标是把东部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提高到大体与西部一致；“文化心理统一”则需要 30 年，要实现人心融合和价值观共识太难了。显然，要实现所有这些“统一”，既需要时间，还需要金钱。自 1990 年以来，德国每年大约要花 1000 亿美元（占德国 GDP3%）用来改造东部，所幸德国人发扬了爱国精神和民族认同感（尽管西部有些人不大情愿），至今仍承受着“团结税”等负担，共同致力于统一大业。德国人用 20 多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上述各方面的“统一”，但至今尚未完全达标，矛盾依然不少，特别在思想方面。

地区发展相对平衡。二战前，一提到德国，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煤钢生产重地鲁尔地区。二战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改革，目前德国早已进步成为一个地区发展相对平衡的国家。这首先表现在德国各州（这里主要是指西部地区）之间，人均 GDP、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大，这有助于大多数居民首选就地安居乐业，避免人口过多流动，利于社会稳定。其次表现在全国人口分布上。在德国，10 万人口以上就算大城市，共有 81 座，居住着全国 1/3 的人口，另有 42%人口住在人口少于 2 万的小城镇，其余的 1/4 人口大多数住在 2 万~10 万人口的城镇里。德国全国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有 4 座，首都柏林人口最多，为 343 万人，汉堡 174 万人，慕尼黑 135 万人，科隆 102 万人，它们正好分布在国土的东南西北。这种人口分布，极大地缓解了特大城市“机会多，来钱快”的吸引力，更不会出现“春运”“冬运”之类的大规模人口来回移动。显然，这也是地区发展相对平衡的结果。最后表现在“经济中心”相当均匀地配置在全国的东南西北中：东部有柏林、德累斯登、莱比锡等，南部有慕尼黑等，西部有科隆等，北部有汉堡等，中间则有法兰克福、莱茵—内卡、斯图加特等。它们各具特色，形象丰富多彩。德国国土面积 35.6 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中国云南省（38 万平方公里）的 93%，但德国的“经济中心”配置状况值得借鉴。

总之，二战后来自国内外一连串重大变革的挑战，总的说来，德国的应对基本上是成功的，长期保持了社会稳定。但目前德国依然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来自欧洲的问题，而德国是绝对离不开欧洲的。德国在欧洲不可能总是“一枝独秀”。德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它本国和欧洲的改革与联合的成功程度。

◆环球瞭望

泰国城市化进程的教训

□王 琛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广泛存在着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即：一方面，在城市存在着较发达的现代经济，相应地也存在着一个较强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享有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在农村却存在一个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相应地也存在着人数众多、比较贫穷的农民大众。这样一种状况就形成了二元社会，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二元社会很容易形成矛盾对立，对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泰国深受这种二元社会之苦，二元社会对立形成了分别代表各自的政治集团，二者矛盾不可协调，街头政治一度成为泰国的一个独特现象。

泰国是个农业国，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化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 60%~70%的人口仍住在农村。泰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1950 年代初期，泰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 13 个百分点，高于东南亚平均水平约 1 个百分点。2005 年，泰国的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水平低了近 16 个百分点，低于东南亚城市化水平 11.5 个百分点。泰国以往历届政府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特别是首都曼谷及其周围地区，所以农村经济一直比较落后，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

1960 年代前，泰国的城市内部除了对自然资源产品的粗加工外，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制造业，经过战后的恢复时期，泰国于 1954 年制定了“工业投资鼓励条例”。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泰国的经济结构开始明显转变。然而，这一时期工业发展中所采用的技术几乎全部来自于西方，缺乏独立自主的技术支持。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 100 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资源短缺，这种状况导致了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恰恰与泰国当时城市所需的发展方式相反，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城市病问题开始凸显。一方面，由于城市正规部门难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使得大量城市贫民不得不受雇于正规就业结构之外的各种行业。事实上，如果不存在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他们流入城市的“期望收入”几乎是零，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由于他们预期到能够从得到城市正规部门工作的机会中获得补偿，因此他们对城市内部新增就业岗位表现得十分敏感。另一方面，这部分城市贫民主要从事资金技术要求低和盈利较快的小商业、饮食业等服务行业，从而使得城市的第三产业在低水平上高速膨胀，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虚假繁荣现象”。

纵观 1960 年代后期泰国的整个城市化过程，是在一种“畸形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下进行的，即城市化过程缺乏农业发展的基础。城市人口的扩张并非是由农业现代化催生出的城市机械人口的增加而造成的，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城市的“拉力”而非农村的“推力”造成的。农村内部大量劳动力的流失以及政府将大量的工业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城市地区，也进一步限制了农村的发展，整个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批城市失业工人返回农村，也进一步加重了农业的负担，泰国城乡人口贫困差异依然明显。

伴随着泰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然而，直到 1990 年代中期，泰国 6000 万人口中只有 50 万人接受过中等教育，学龄前失学儿童 91%集中在农村，教育体制的落后以及人力资本地区性分配不均使得泰国工业化进程不得不面临人力资本的匮乏问题。事实上，1960 年代初期，泰国政府在制定第一个经济发展长期计划时就十分重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970 年代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年增长率为 34.5%，1990 年教育经费已经占到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 19.2%。但是泰国政府的这一努力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首先，泰国多数中学都分布在城镇，农民孩子去城镇读书课余时间就不能帮助家庭进行生产活动，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因而增加了农户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其次，泰国农村非集约化的生产技术状况使得学生毕业后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学到的知识很难能够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从而增加了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风险。在有限的农业收入制约下，许多农户不得不放弃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投资。例如，1999 年仅仅因交不起学费和为了家庭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的学生占总辍学学生的比例就达到 63%。最后，诱致性的教育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市场中不但雇佣方可以更加容易采取有效的甄别机制雇用到满意的员工，受教育者也更容易通过信号显示机制找到满意的工作。由于泰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相对落后，高等教育接受群体的高失业水平反而越发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降低了泰国国民对教育投资的偏好。

统计数据表明，2007 年，泰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为 12%，高出城市地区近 3 倍；全国八成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曼谷及其周边地区，而占全国总人口近半数的泰国东北部、北部农村仅拥有不足 10% 的工业。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0 年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泰国的贫富差距比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邻国都大得多。2009 年，泰国国内最富有的 20%人口比最穷的 20%人口的收入高出 14.7 倍，60%的人口所分得的财富仅占其总额的 25%。不难看出，泰国的城乡经济鸿沟和贫富差距是历史形成的，但是只要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鸿沟和差距就会逐步缩小。然而，以往的泰国政府并没有真正关注过农村的发展。客观地说，他信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认真关注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总理。他信政府先后提出一系列惠农政策，包括允许农民推迟还债三年，给每村 100 万铢贷款作为发展基金，实施“一乡一产品”种植，“30 铢治百病”等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在 2001— 2005 年他信当政的 5 年中，农民的收入提高了 60%。这使最讲究实际的广大农民对他信感恩戴德，成为他忠实的支持者。在他信惠农政策的背后是以牺牲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例如，“30 铢治百病”医疗计划，主要是为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民设立的，但这一计划的实施降低了医院的利润，减少了医生的收入。而政府用于这些扶贫项目的支出主要来源于中产阶级（包括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各种专业人士）所得税的提高。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举步维艰，20 所大学的 1 万多名年轻教师因被纳入他信所倡导的脱离公务员队伍计划而加薪无望。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制改革，使得自来水、煤气、电力等公司的职工下岗。所有这些都引发了曼谷城市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不满，他们成为反他信的主体力量。

所以，泰国的城市化过程并没有解决好各方的矛盾，反而突出了二元社会的矛盾冲突，成为导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直接原因。

欧盟的全球应急响应能力建设

□游志斌

2013 年 11 月 8 日，超级台风“海燕”在菲律宾中部登陆，对其造成严重影响，菲律宾的许多地区电力、通讯中断，空中和海上交通全面瘫痪，数千人死亡，百万人疏散避难。灾害发生后，欧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EUCP），向菲律宾提供紧急援助，通过该机制，比利时、德国、匈牙利、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分别派出医疗、净水、搜索和救援、通讯、评估等专业队伍，并向灾区运送帐篷、食品等应急物资，与此同步，欧盟还向菲律宾政府提供 300 万欧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援助资金。近年来，2004 年印度洋海啸、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2008 年汶川大地震、2010 年海地大地震、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和非洲之角饥荒等重特大突发事件都可以看到欧盟的身影。目前，加强和加快对全球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是欧盟共同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欧盟扩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形式。近年来，欧盟从体制、机制、队伍等方面大力加强其全球应急响应能力建设。

改革应急响应体制

欧盟自成立以来，一直把提升包括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应急救援队伍派遣等在内的全球应急响应能力作为其发挥全球影响力的有效渠道，并作为在联合国体系中发挥关键角色的重要途径。1999 年在完成土耳其大地震救援后，欧盟评估和总结其应急救援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进一步整合成员国应急资源，以加强各成员国间在应急响应工作中的协调。随后，根据 2001 年欧盟理事会的决议，欧盟确定了要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实现各类有关政府服务部门、工作网络和系统、专业人员与欧盟机构在协调和指挥方面相统一；同时强调各成员国要组成最优组合，利用其独特的结构、多国工作人员以及全方位的网络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应急响应合作。2012 年 9 月 25 日，欧盟发布的《关于欧盟人道主义救助和民防保护执行的 2012 年年度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欧盟在全球的应急响应能力。

目前，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体。1992 年，该委员会的欧洲共同体人道主义办公室（简称 ECHO）成立，长期向世界各地冲突和灾难中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10 年以来，欧盟进行了大规模的涉及管理机构的调整，合并了欧盟人道主义办公室和民防保护两个重要部门，建立了欧盟人道主义和民防总局（简称 DG ECHO），把欧盟内外部的应急资源和欧盟长期以来针对外部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有效结合起来，为欧盟实现人道主义和民防工作的整合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截至 2013 年 6 月，欧盟人道主义和民防总局总部人数已经达到 302 人，能够在短时间向欧盟以外派遣 145 名专家进行援助；另外在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44 个办事处，并拥有 460 名海外工作人员。从统计来看，欧盟应急响应制度在 2012 年共启动了 38 次，其中 31 次与自然灾害有关，另外 7 次涉及人为灾害（如爆炸、建立难民安置营、海上污染等）；在欧盟内部启动了 16 次，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启动了 22 次。为适应欧盟在全球应急响应的需要，2012 年欧盟大规模追加预算到 13.44 亿欧元。

完善快速响应机制

建立适应全球快速响应的机制是欧盟提高全球应急响应能力的关键环节。2003 年，在建立欧盟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条约，以及 2001 年 10 月 23 日欧共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 2001/792 委员会决议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应急响应机制（简称 EUCP，也译作“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欧盟要建立共同体的应急信息沟通机制，该机制包括使用和分享成员国最新的、可用的资源信息，以便在应急响应中更好地使用这些资源；同时，为了服务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建立了监控和信息中心（MIC），能够每天 24 小时的值班，并能够在成员国之间开展应急协调。为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机制，2013 年 5 月 15 日，欧盟正式启用了应急响应中心（ERC），欧盟主席巴罗佐在启动仪式上称其为“欧盟应急响应运作的核心”，ERC 取代和升级了以前的监测和信息中心的功能，能够开展在全球不同时区、多个区域开展应急响应，ERC 拥有各类应急专家，并应用了最新的卫星图像分析系统、预警和传输系统等管理工具，大大增强了应急监测和信息研判能力。截至 2013 年 9 月，共有 32 个国家（其中四个为欧盟外国家）加入了欧盟应急响应机制，以促进更好的应急响应工作。

另外，欧盟高度重视与全球从事人道主义救援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固定的合作机制。欧盟注重发挥在联合国体系中的作用，并通过建立欧盟外部的伙伴关系，努力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应急响应机制。目前，欧盟人道主义和民防总局有超过 200 个合作伙伴（包括 14 个联合国机构、191 个非政府组织和 3 个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与这些人道主义组织建立合作机制，有利于欧盟大幅提高应急响应的效率，特别是在巨灾发生后能够让援助资金和人员迅速部署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欧盟一直在酝酿支持建立志愿者组织，目前欧盟正在起草欧盟支持应急志愿者的法令，积极培训欧盟以外的应急志愿者，并支持他们在非欧盟国家开展人道主义行动，进而增强欧盟外部国家的抗灾力和应急能力。

构建应急响应模块

构建快速应急响应模块是欧盟提高全球应急响应能力的重要基础，加强构建应急响应模块是 2020 年之前欧盟整个应急管理工作的重点。所谓应急模块（module），通常是指担负专业化任务的应急单位。比如，搜索和救援、高容量的抽水、空中救火等，这些模块通常是由欧盟成员国自己准备、自愿提供的资源，它们可用于欧盟内外的应急响应工作，模块可在极短时间内（一般在 12 小时内）迅速出动，并能够在短期内独立补给，并依据相关的国际指南进行配备、培训和运作。2004 年 12 月的南亚海啸之后，欧盟深刻总结在应急救援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建立应急模块，以加强和加快应急力量的部署。在 2005 年 6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总体概念，呼吁建立基于成员国的自身应急模块之上的欧盟快速响应能力。

2007 年以来，欧盟理事会和成员国大力发展应急响应模块，并规定了 17 个模块类型的技术框架，这些模块的类别包括了泵水、水的净化、空中灭火、城市搜救（重装和中度装备）、医疗救助（高级的临时医院、野战医院）、应急避难所、核生化的监测和样品检验、核生化条件下的搜索和营救、地面森林灭火、特殊洪水救援等；明确界定了应急模块的任务、能力、组成要素和部署时间，规定了在响应行动中的互动和自我维持要求。通过几年的实践，欧盟人道主义事务和民防总局认为，应急模块是提高应急响应的有效方法，并需要在应急演练中进一步加强各种模块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工作，以提升其应急效率。2010 年以来，欧盟每年都安排大量的应急模块专项演练。比如，今年 10 月 25 日至 28 日，欧盟在比利时的安德卫普，以防洪为主题，举办了本年度最大规模的应急模块实战演练，包括比利时、克罗地亚、法国、德国、卢森堡、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泵水、水净化、核生化监测等应急模块都参加了本次演练。